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二戴《禮記》曾子諸篇的寫作年代、學術譜系及其與先秦兩漢儒籍的關係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26-
執行期間：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葉國良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10 月 30 日

一、中英文提要

（一）中文提要

曾子為孔門重要弟子，其學派之著作理當重視，前代學者或以為《禮記》〈曾子問〉、〈大學〉及《大戴禮》〈曾子立事〉等十篇屬之，朱熹且建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學術譜系，為之闡釋不遺餘力。唯後儒亦有以為二戴《禮記》多出漢人，頗加蔑視。頃因郭店戰國竹簡中有〈緇衣〉，上海博物館所收戰國簡亦有小戴〈緇衣〉、〈孔子閒居〉及大戴〈武王踐阼〉，則先儒以二戴《禮記》多出七十子之言，關涉先秦儒學之流變，自不宜漠然視之，應予重新檢討。

本計畫先收集歷來探討曾子學派之著作，並參酌新出土之資料，重新從思想層面、具體內容、詞彙使用等方面考察二戴《禮記》中與曾子相關諸篇，側重探討其著作年代、學術譜系及其與先秦兩漢儒籍之關係，俾能釐清現存先秦兩漢儒籍之部分學術譜系，而有助於儒學史之研究。

（二）英文提要

Tzeng Shen （曾參）is an important disciple among the Confucianists. The writings of his school should be paid many attentions to. Some of the early scholars took *Tzeng Tzyy Wen* （曾子問）and The Great learnings in Dai-Sheng`s *The Book of Rites*（小戴禮記）and 10 compositions in Dai-De`s *The Book of Rites*（大戴禮記）, these 12 compositions as Tzeng Shen School`s writing. Chu Shi（朱熹）had done his best 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genealogy –Confucius,Tzeng Shen,Tzu Si （子思）and Mencius(孟子). But some of the later scholars considered these two versions (Dai-De and Dai-Sheng`s *The Book of Rites*) were written by some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looked down upon them. Especially the scholars in the Main Land, who study and research the philosophy of the ere before the Chin Dynasty and the Han Dynasty, usually ignore that early scholars had mentioned that many of the contents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Rites* written by the disciples among the 70 Confucianists. Soon, there were the composition *Tzyy I* （緇衣）of *The Book of Rites* i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Guo-Dian （郭店） and there were *Tzyy I* and *Kung Tzyy Xian Ju*（孔子閒居） in Dai-Sheng`s *The Book of Rites* and *Wu Wang Jian Zuo*（武王踐阼）in Dai-De`s version in the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collected and kept in Shang-Hai Museum（上海博物館）. This fact revealed that many analects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Rites* were from the 70 disciples, and it was connected with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era before the Chin Dynasty・Thus,we should review and discuss them instead of despising them.

In this project, at first, we intend to collect the literary works which discuss the

School of Tzeng Shen till now, then to consult and deliberate the unearthed data, and to re-examine the compositions in the two version of *The Book of Rites* in involved with Tzeng Shen, then to place particular emphasis on discussing when the compositions were completed and the academic genealogy, and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s by the School of Tzeng Shen and the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Rites* in the era before the Chin Dynasty and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is project, maybe we can distinguish some parts of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the Confucian works in the era before the Chin Dynasty and the Han Dynasty. Thi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reserch of Confucianism.

二、報告內容

（一）前言及研究目的：詳提要。

（二）研究方法：

申請人以地毯式蒐集方式，收得先秦兩漢儒籍中有關曾子言行之記載，所得大抵與前人所輯《曾子家語》、《曾子全書》等著相類，可以確定資料無大遺漏，唯該等書或兼收緯書及偽書（如《孟子外書》），自當加以裁奪。

收集資料既竟，再以二戴《禮記》曾子諸篇為主體，從思想、內容、詞語等幾個角度先和二戴《禮記》（主要是小戴）中與曾子有關者加以比對，再和其他先秦兩漢典籍比較。

（三）文獻探討

申請人閱讀二戴《禮記》中前人以為屬於曾子一派之學者十二篇，以為此諸篇皆戰國時代作品，唯不必為一人所作。

申請人詳閱此十二篇，以及子思學派所屬〈中庸〉、〈緇衣〉、〈坊記〉、〈表記〉、〈累德〉（已融入《淮南子・繆稱》中）和《孟子》，從後者對前者稱引之頻、使用詞彙辭句、思想特點頗多相同各點，贊同朱熹所主「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學術譜系之說。此點，申請人前撰〈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已曾論及，執行本計畫期間，復撰〈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以晁說之《中庸傳》之寫作動機與影響為例〉，文載《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11 月）贊成宋人晁說之所主曾子書與〈中庸〉有密切關係之觀點，對於晁氏因當時王安石新政之關係而排《孟子》則不以為然，蓋《孟子》書中對曾子、子思徵引稱述頗多，推崇之意，溢於言表，關係至深。

按：二戴《禮記》中曾子諸篇，以先秦儒家著作之數量言，僅次於《孟子》、《荀子》，而二家徵引亦最多，其重要可知。《韓非子・顯學篇》記戰國末期八派

儒者，其中無曾子一派，申請人推測：此蓋戰國末期曾子學派無著名學者，且其學說已為子思、孟氏及樂正氏之儒所吸收之故。然曾子本孔門重要子，故其學派著作仍能傳至漢初而為二戴所收。

（四）參考文獻

禮記注疏　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疏　台北・藝文・十三經注疏
禮記集說　宋・衛湜　台北・大通
續禮記集說　清・杭世駿　通志堂經解
大戴禮解詁　北周・盧辯注　清・王聘珍　北京・中華
大戴禮記補注　清・王樹　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
大戴禮記斠補　清・孫詒讓　台北・文史哲

曾子全書　明、曾承業、周延儒　（臺大善本）
曾子十篇　明・沈泰　（臺大善本）
曾子十二篇　北周・盧辯注　清・孔廣森補注　清・王闓運箋　台北・廣文
曾子十二篇今注今譯　高明　台北・臺灣商務
曾子家語　清・曾國荃・王定安　台北・臺灣商務・國學基本叢書
曾子注釋、敘錄　清・阮元　漢京・皇清經解本
曾子孝實附錄　明・朱鴻　（臺大善本）
曾子問講錄　清・毛奇齡　莊嚴文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曾子立事天圓補注　清・王樹　陶盧叢刊（臺大善本）

曾子考　武內義雄　台北・河洛・先秦經籍考
大戴禮記盧辯注研究　李明慈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研究　郭霖　台北・旋風
禮記曾子問「三月廟見」考辯　季旭昇　中國學術年刊九期
禮記曾子問篇的老聃　楠山春樹　台北・駱駝・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

子思子全書　宋 汪晫 編　台北・台灣商務・四庫全書
子思子七卷　清 黃以周輯解 上海・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又台北・廣文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　清 簡朝亮　上海・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
子思研究　日・下斗米晟　東京都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
論語編者子思的考證　曹文蔚　台南・南一書局
子思子書六卷　清馮雲鵷輯 聖門十六子書　上海・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

中庸考　日・武內義雄著 江俠菴譯 在《先秦經籍考》中，又，台北・河洛
子思作中庸的推測　金德建 在《司馬遷所見書考》中 上海・上海人民

論子思作中庸于宋地　金德建 在《司馬遷所見書考》中 上海．上海人民
子思之學說　王國維　在《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子思和中庸　李學勤　在《失落的文明》中　上海．上海文藝
思孟學說　　李學勤　在《失落的文明》中　上海．上海文藝

中庸作者及其哲理研究　張學波　孔孟月刊 5 卷 7 期　1967.3
中庸的作者問題成書年代及其思想之衡定　楊祖漢　鵝湖 9 卷 10 期 1984.4
中庸作者是子思嗎　　廖煥超　營口師專學報 1989 年 1 期　1989
關於中庸的作者及其著作年代　鄒玉現　山西大學學報 1990 年 1 期　1990.1
中庸作者獻疑　　廖煥超　孔子研究 1990 年 2 期(總 18 期)1990.6
子思及中庸研究　李啟謙　孔子研究 1993 年 4 期(總 32 期)1993.12

孔子家語疏證　　清．陳士珂　　諸子集成補編本
孔子集語　　清．孫星衍　　諸子集成補編本
孔叢子　　漢．孔鮒　　宋．宋咸注　　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本
論語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台北．藝文．十三經注疏本
孝經　　唐．唐玄宗注　　宋．邢昺疏　　台北．藝文．十三經注疏本
孟子　　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　　台北．藝文．十三經注疏本
呂氏春秋　　漢．高誘注　　台北．世界
淮南子　漢．高誘注　　台北．中華
四書集註　宋．朱熹　台北．學海

郭店楚墓竹簡　　北京．文物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第二冊　馬承源等　上海．上海古籍
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郭店楚簡研究　　姜廣輝等篇　　瀋陽．遼寧教育
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郭店簡與儒學研究　　姜廣輝等篇　　瀋陽．遼寧教育
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論文集　　武漢．湖北人民
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　　葉國良　　臺大中文學報第十三期
其它相關哲學史、人性論史著作

（五）結果與討論

申請人在本計畫範疇內，撰有〈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以晁說之《中庸傳》之寫作動機與影響為例〉，文載《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11 月），唯討論範疇，除子思學派各篇及《孟子》外，其他雖有構想尚無撰作，是為遺憾，然亦勉強符合當初申請計畫時所提「本計畫完成，預計撰寫論文一至二篇」之自我期許。茲將該論文附錄於後。

附錄　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以晁說之〈中庸傳〉之寫作動機與影響為例

一、前言

先秦古禮書之研究，蓋有三難：以內容論，有記實者，有出於儒生主張者，有兼俱以上二項者，未易一覽而明，此則著述宗旨不易掌握之難也。以源流論，孔子卒後，弟子不無異言，甚且有儒分爲八之說，而先秦古禮書多不著撰人，此則其所代表之學術譜系不易確知之難也。若欲參考漢代以降學者之傳注，則其著作有「實事求是」以疏證者，有「舊瓶裝新酒」別抒懷抱者，尚須梳理分辨，方知去取，此則前哲之成說非皆可賴之難也。有此三難，則先秦古禮書之詮釋與定位迄今猶多異議，固意中事也。

然凡著述必有宗旨，議論必有淵源，故研究先秦古禮書雖有上述三難，仍當有線索足資探討，視吾人如何以合理有效之方法研究之耳。余嘗謂其中得失，宋儒晁說之〈中庸傳〉可爲藉以探討之一佳例，今試論之如下，以驗證拙見。

民國六十七年夏，余已任龍師助教三年，時撰寫碩士論文《宋人疑經改經考》[1]將近尾聲，對晁說之〈中庸傳〉曾稍涉及，因故未得深論，而轉瞬竟閱二十四載，未再措手。茲逢龍師七秩晉五華誕，謹以此文爲壽，亦思前塵而誌往事之意也。

二、晁說之及其〈中庸傳〉

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司馬光嘗自稱迂叟，說之慕其爲人，因自號景迂生。後以學佛，又自號天台教僧、老法華。又家有晁宗慤所書飛白「國安」二大字，亦號國安堂主。生於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登神宗元豐五年（1082）進士第，累官至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卒於高宗建炎三年（1129），享年七十一歲。[2]

說之爲晁迥五世孫，學問淵博，著書三十二種，其中有關經學者十九種，後遭靖康之變失之略盡，今可得見者，僅《嵩山文集》及《晁氏客語》二書，而可據以研究晁氏學術者，唯《嵩山文集》。[3]《嵩山文集》二十卷，除詩作外，所存

---

[1] 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年），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0 年），第 55 種。

[2] 關於晁說之字號、官祿及生平梗概，參〔宋〕晁說之：《嵩山文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影印《四部叢刊續編》本），卷 20 後附其孫晁子健所撰識語。

[3] 關於晁說之著作目錄及其存佚情形，詳參《嵩山文集》，卷 20 後附其孫晁子健所撰識語。《嵩

論學及書奏諸卷，略可考知其經說：大抵於《易》尊揚雄、邵雍，於《詩》斥〈詩序〉，於《書》曉曆法、改〈洪範〉，於三《傳》各有褒貶，三《禮》雖無專著而有〈中庸傳〉尚存集中，崇尚曾子、子思之說，此外則以推尊《論語》、排詆《孟子》著稱。[4]

《宋元學案》入說之於〈涑水學案〉，蓋以其一生言論，始終追步司馬光，反對新學新政之故。今觀《嵩山文集》，其反對新學新政，或明言，或微言，觸目皆是，在宋人集中，實屬鮮見。依筆者所考，其〈中庸傳〉實亦爲反對新學新政而作。此事本無須深究，然該〈傳〉保留若干漢唐及宋初學者句讀之異於朱熹《中庸章句》者[5]，又爲〈中庸〉最早之改本，且於後世不無影響，則亦〈中庸〉學史之一重要文獻，宜加考校。乃世鮮論之，何也？

〈中庸傳〉作於徽宗政和五年（1115），載《嵩山文集》卷十二前半，凡六千五百餘字，其中〈中庸〉原文三千五百餘字，按語僅約三千字，篇幅短小。該〈傳〉依〈中庸〉原文次第，分爲八十二節，首開將〈中庸〉全文分節之風氣[6]。其作傳體例，先抄錄各節字句，其上冠以朱色○符號表示下引前人見解，黑色○符號表示下據胡瑗見解，以黑色●符號表示下有個人意見，各節字句之下則引述先儒、鄭玄、王肅、皇侃、熊安生、陸淳、胡瑗、張載、劉敞、司馬光、程顥、程頤、姚子張、近世學者（撰按：隱指新學）等前人具體意見[7]，間或略綴數語論之。故其用語雖甚簡約，而意義則頗豐富，引據前人語或自出己見處，亦極分明。細閱其文，要旨厥有三端，下文分別陳述之。

（一） 以中庸即「用中爲常道」，中庸非二事；以極高明即道中庸，亦非二事

山文集》爲研究晁氏學術之主要依據。至於《晁氏客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乃晁氏雜記所聞友朋之語，故云「客語」，每條之下，或標記客名，或否，要非皆晁氏自記己見。故其間有與晁氏一生言論相左者，如晁氏譏詆孟子，而《客語》中有推崇孟子語，即其一例，又如〈中庸〉「其次致曲」一節，晁氏〈中庸傳〉疑其說不合義理，而《客語》中有就其義理發揮者，又爲一例。故論晁氏學術者，不宜逕引《客語》爲說。

[4] 關於晁說之學術，詳參《嵩山文集》，卷 1，〈元符三年應詔封事〉，以及卷 10 以下諸卷。

[5] 如「君子之道，費而隱」，朱熹《中庸章句》屬下讀，與下「夫婦之愚」一段合解，定爲第十二章，遂有體用之論。而鄭玄、孔穎達及宋初諸儒則屬上讀，與「素隱行怪」一段合解，故釋爲道倫而隱，與朱熹不同。此賴〈中庸傳〉而確知。

[6] 〔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影印《四部備要》本），卷 151，曾記錄〈中庸傳〉所分節次之起訖，但未加分析。或以爲孔穎達《禮記正義》中「此一節」云云，即分節之始，則爲不詳孔疏體例之誤解。

[7] 據《經義考》卷 151，胡瑗有《中庸義》一卷，司馬光有《中庸廣義》一卷，姚子張有《中庸集》，皆注「未見」。陸淳、張載說則不知何本。撰按：上舉諸家說今賴晁說之〈中庸傳〉略可考知。

細閱〈中庸傳〉，晁說之論「中庸」之義，最主要者有貳：

其壹，「中庸」一詞究爲何義？晁說之主鄭玄《禮記注》「用中爲常道」之說。〈中庸傳〉於「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一節下云：

> 中之所以為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用中為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

又文後跋語曰：

> 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貳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

可見持中庸是一非二之說，不得拆爲「中」與「庸」之說，爲〈傳〉之主要宗旨。

其貳，晁說之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一事，力排「極高明」與「道中庸」爲二事之說。〈中庸傳〉於「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一節下云：

> 率性修道，于是乎極也。思尊德性，則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瞽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又《嵩山文集》卷 13〈儒言〉「高明中庸」條亦云：

>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去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言之者再，足見晁說之之重此義。

唯晁氏之說，並非新意。關於不取「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之說，而解「中庸」爲「用中爲常道」，乃本之鄭玄。關於極高明與道中庸非二事，宋人之前於晁氏辨之者亦頗多，如程子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張載曰：「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極高明須道中庸。」橫渠所謂「逐句爲一義」即不可析極高明與道中庸爲二之意。游酢曰：「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體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時曰：「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知之過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不肖者無以異也。」[8] 其說皆同。

前人既已標舉上舉二義，而晁說之仍作〈中庸傳〉力持其說者，除晁氏以爲〈中庸〉有錯簡誤字待改外，實爲新學新政而發故也。此意將於下節明之。

（二）以〈中庸〉有錯簡誤句，當改

先是，歐陽修曾懷疑〈中庸〉之言有違孔子之道處，以此策問進士。[9]晁說之則以爲〈中庸〉有錯簡、有誤入之簡、有誤字、有漏字，故其文雖稱〈中庸傳〉，究其實乃爲〈中庸〉改本，且爲迄今所知之最早改本。

按：〈中庸〉，鄭玄注謂「禮所生也」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二句爲後文脫誤重出者；王肅本「小人之中庸也」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然此尚不得稱爲改本。而晁說之於〈中庸傳〉篇後論《禮記・中庸》云：「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錯哉。」故於〈中庸傳〉按語中除接受上舉鄭玄、王肅說之外，又指出其間錯謬之處。茲分述如下：

〈中庸傳〉於「子曰：舜其大孝也（至）必得其壽」下云：「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

於「詩曰：嘉樂君子（至）故大德者必受命」下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簡編之繆也，無聞焉爾也。」

於「子曰：無憂者（至）子述之」下云：「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

於「武王纘大王、王季之緒（至）子孫保之」下云：「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

---

[8] 以上程子、張載、游酢、楊時各家說，詳見〔宋〕衛湜：《禮記集說》（臺北：大通書局，1969 年影印《通志堂經解》本），卷 134 引。據《經義考》卷 151，游酢有《中庸解》五卷，楊時有《中庸解》一卷，皆注「未見」。

[9]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卷 2，《居士集二》〈問進士策〉三首之三。

於「郊社之禮（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下云：「無聞焉爾也，疑簡編脫繆于此也，嘗有見于〈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于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

於「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下云：「鄭氏云：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

於「其次致曲（至）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下云：「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

於「至誠之道（至）故至誠如神」下云：「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姚子張皆疑之。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於「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則謂「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按：所引曾子語，見《大戴禮．曾子疾病》，唯「至」字作「志」。

總以上所述而推晁說之之意，可略知其主張如下：「郊社之禮（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一節，由〈仲尼燕居〉誤入，當刪除。「其次致曲（至）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下謂「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蓋以既言「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乃是「自誠而明者」，與前文「自誠明，謂之性」相類，而乃謂「其次」，於理不合。「至誠之道（至）故至誠如神」下謂「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姚子張皆疑之」，蓋以文中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云云，事涉玄虛[10]，故亦可疑。是隱謂此兩節，義理不合聖道，當在刪除之列。至謂「子曰：舜其大孝也（至）必得其壽」一節當次「詩曰：嘉樂君子（至）故大德者必受命」者，蓋以「故天之生物（至）傾者覆之」一節文意與前後文不相屬。又謂當改「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爲「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者，則據〈中庸〉下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之次序及《大戴禮．曾子疾病》言之。其餘謂「無

---

[10] 〔清〕杭世駿：《續禮記集說》（臺北：明文書局，1992 年影印浙江官書局本），卷 89，引姚際恆曰：「前知二字，聖人之所不道。觀子張問十世，而夫子答以因禮之損益可知，可見矣。自此云前知，開後世無數術數之邪學，抑且啓後世人主好尚符瑞之心，必不可訓也。況其所謂前知者，不過見乎蓍龜之事，夫既卜筮而見乎蓍龜矣，雖愚百姓亦可憑之以知休咎，乃以之詫至誠之如神，豈不陋而可笑乎！」其說蓋即胡瑗、司馬光、姚子張、晁說之等人之意。

聞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諸節，蓋以爲乃〈中庸〉本文內之錯簡，唯未言當置於何處耳。綜觀之，其疑改之幅度不可謂小。

（三）以〈曾子〉諸篇印證〈中庸〉，隱指二者思想有承續性

晁說之解〈中庸〉，有一特色，爲他家罕見者，即引《大戴禮》〈曾子〉諸篇[11]印證〈中庸〉。如「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一節下云：「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爲誠，知爲明，其實一也。」於「子路問強（至）至死不變強哉矯」一節下云：「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於「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一節下云：「曾子曰：『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爲援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撰按：前引曾子言，見《大戴禮・曾子立事》，後引者見《大戴禮・曾子本孝》。晁說之又於「故至誠無息（至）則其生物不測」一節下論「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當作「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並謂：「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撰按：所引曾子語，見《大戴禮・曾子疾病》，唯「至」字作「志」。凡此，足見晁說之極力證明「曾子、子思」關係之企圖。

解〈中庸〉者，多引《孟子》而不引〈曾子〉諸篇爲說，晁說之何以反是？依筆者之見，晁氏蓋欲以「曾子、子思」取代「子思、孟子」在儒學中之地位。按：晁說之以詆孟子著稱，世所熟知，茲僅略引數語證之。如《嵩山文集》卷12〈儒言〉「孔孟」條曰：

>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又卷14「志學」條云：

> 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歧廣騖，不住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

---

[11] 按〈曾子〉諸篇見《大戴禮》中，而亦有以《曾子》爲名單行者。

釋氏之徒也。

其意蓋以爲子思得曾子之傳，更接近孔子思想。其著〈中庸傳〉，所以引〈曾子〉諸篇言印證〈中庸〉語者，蓋欲以「曾子、子思」取代「子思、孟子」之儒學譜系，此在唐宋人「道統說」中，別樹一幟。《嵩山文集》卷 18 載有政和乙未（五年）所撰〈曾子後記〉曰：

> 予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宜其文字回舛謬誤，輒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頗是正。

晁說之之校《曾子》，與其撰〈中庸傳〉同在政和五年，足見以上之推論不誤。

統本節所述三項觀之，晁說之〈中庸傳〉於義理闡發方面並無新說，蓋爲反對新政新學而發，前人似未注意，宜揭舉之；對文本次第方面有疑有改，今姑不論其是非，對後世實有影響，亦宜詳加闡發；至於論〈曾子〉諸篇與〈中庸〉之關係，今人多忽視之，則似可續加探討。以下再分節論之。

三、論〈中庸傳〉爲反對新學新政而發

王安石有《禮記發明》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其徒馬晞孟（撰按：一作希孟）有《禮記解》七十卷、方慤（撰按：字性之）有《禮記解》二十卷，其書今皆不存[12]，而《禮記集說》間採其說。唯是全祖望〈王昭禹周禮詳解跋〉謂：「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甫（撰按：名原）之《易》，方性之、陸農師（撰按：名佃）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13]據此，新學諸說雖曾盛行一時，而今之所存皆其醇者，其不醇而爲當時所反對之說今多遺佚，職此之故，今日已不易考見新學種種言論，其關於〈中庸〉者亦然。無已，唯有從蛛絲馬跡中勾勒之，以證實本文所論。

查晁說之所以反對分中庸爲二者，乃針對王安石而發。其〈答朱仲髦先輩書〉曰：

> 說之啟：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中庸」曰：「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撰按：胡瑗）、司馬溫公之〈傳〉，則益知（原注：一作尊）鄭說矣。彼新學出而拘拳以為法，穿踰以為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

---

[12] 以上四書，見《經義考》卷 141，皆注「未見」。

[13]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影印《四部叢刊續編》本），《外編》，卷 27。

以故彼之學者惟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者，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也。嗟乎！學之難也。伊川已（原注：一作晚）自畔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何望哉！……[14]

據此，則〈中庸傳〉爲闢新學而作甚明。至其言「伊川已（晚）自畔之」者，謂程頤主張「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乃析「中」「庸」爲二也。

晁公武爲晁說之侄子，其《郡齋讀書志》論其叔所作〈中庸篇〉（撰按：即〈中庸傳〉）亦言：

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撰按：程頤）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撰按：程顥）、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15]

又論楊時〈中庸解〉曰：

（楊）時載程正叔（撰按：程頤）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16]

前者之「近世學者」即指新學，後者更明指王安石矣。蓋當時王安石確有分中庸爲二之說，其後程頤仍之（撰按：後朱熹又載入《中庸章句》），故晁公武云「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至於反對分極高明與道中庸爲二，亦指王安石。王安石有〈洪範傳〉[17]，載《王安石文集》中，曾論及高明、中庸之事。〈洪範傳〉以〈中庸〉之文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一段曰：

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

是王安石以爲始則遵義，極高明，中間經一段過程，最後達到中庸；然則王安石果分極高明與道中庸爲二也。考王安石之見解，間亦見於《禮記集說》所引宋人說，如延平周氏曰：「尊德性然後致廣大，道問學然後盡精微，致廣大然後極高，盡精微然後極明，高明既極矣，而天下爲難繼，故俯而道乎中庸。」撰按：周氏所謂「高明既極矣，而天下爲難繼，故俯而道乎中庸」，即分極高明與道中庸爲

---

[14] 〔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 15。

[15]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影印《書目續編》本），卷 2。

[16] 同前註。

[17] 〔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文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卷 40。

二。又如晉陵喻氏曰：「極高明而復道中庸，異乎賢者之過乎高、知者之過乎明者矣。」撰按：喻氏所謂「極高明而復道中庸」，即「極高明而反道中庸」，乃晁說之斥爲「近世瞽學之說」（撰按：已見第二節引），是亦分極高明與道中庸爲二。[18]周、喻二氏蓋皆本王安石爲說也。

晁說之何以於此二事斤斤辯之？依筆者之見，蓋爲新學新政之故。考王安石既以中是目標，過程可不必持中，故其施行新政，與其論學一貫，每析手段與目標爲二，此最爲所謂舊黨所反對者。魏了翁《周禮折衷》曰：

> 荊公（撰按：指王安石）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於法，亦不見其於道。荊公以法不豫道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因說永嘉二陳（撰按：指陳亮、陳傅良）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為法外之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為二，後學從而為此說。曾於南省試院為諸公發明之，眾莫不伏。於《周禮》一部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鄉遂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為申、商。[19]

王安石析道、法爲二，即將手段與目標分之爲二。如此，則爲達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元城語錄》記載：

> 老先生（撰按：指司馬光）嘗謂金陵（撰按：指王安石）曰：「介甫（撰按：王安石）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在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撰按：指呂惠卿），雖悔之亦無及也。[20]

由此可見，王安石將手段與目標分之爲二之思惟方式與行事風格，不能爲舊黨接受。晁說之爲文不便明言，然皆一一隱指，熟悉晁說之學術及言論者，一讀自知

---

[18] 以上周氏、喻氏說，見《禮記集說》卷 134 引。周氏，指周諝，諝有《禮記解》，解其中十七篇，《經義考》卷 141 云「未見」。晉陵喻氏，指喻樗，樗有《四書性理窟》，《經義考》卷 252 云「佚」。

[19] 〔宋〕魏了翁：《周禮折衷》（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宣統二年官印刷局重修刊本），卷 1。唯《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引，「亦不見其於道」作「亦不見其爲道」，「荊公以法不豫道揆」作「荊公以法不豫道」，較勝，「於」蓋涉上文而訛，「揆」蓋涉上文而衍。

[20] 〔宋〕馬永卿：《元城語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

其所謂「瞽學」、「穿鑿」，即指新學，新學在當時爲新政後盾，攻新學即所以攻新政也。[21]

四、論〈中庸傳〉對後世〈中庸〉改本之影響

晁說之〈中庸傳〉雖無改本之名而有其實，古人或如此[22]，吾人不必拘泥形式。稍後於晁氏，紹興年間，有陳善者，亦據《論語》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郊社之禮（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爲漢儒誤讀《論語》因而立說誤入者[23]，其疑略同晁氏。

又：晁說之於〈中庸傳〉篇後論《禮記・中庸》云：「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爲何書也。」是晁說之不以今本〈中庸〉與《中庸說》爲一書，然其說對後世據《中庸說》有兩篇之記載而析〈中庸〉爲二篇之改本者實有影響。

首析〈中庸〉爲上下兩篇並大加改易者，爲南宋王柏（1197-1274）。唯其所撰《古中庸》，今佚，學者多不詳其說，程元敏先生《王柏之生平與學術》[24]第參編第三章〈中庸說〉始考見其始末。核其實，王柏據朱子《中庸章句》之分章而又加以離合改易，分爲兩篇，篇各十三章。自朱子《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至）明則誠矣」起析爲下篇，而將第二十四章移至第二十六章後，又將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章移至第二十四章後，再將第二十章前、後段移至第十九章後，成爲下篇。至於上篇，則移第十五章次第十三章前，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章則移至第二十章中段後而成。此其大要。王柏改易過程與理由之詳細說明，可參看上揭程元敏先生書，此不贅述。

今所欲論者，晁說之〈中庸傳〉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衛湜《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四亦引用多處，是其書流傳非不廣，取晁說與王說對照，其對

---

[21] 〔宋〕衛湜：《禮記集說》，卷 134，引鄭樵曰：「離人而談天，離中庸而談高明，老釋之說也。」王安石學術被評爲雜有老釋之說，鄭樵「離中庸而談高明」之語，即隱指王安石，所採方式與晁說之相同。

[22] 如宋人林之奇對〈大學〉字句之次第有所主張，存於其所著《拙齋文集・道山紀聞》中，僅以隨筆方式表達，並未以完整改本之方式出現，唯仍不害爲意見表達清楚之改本。詳參拙作〈介紹宋儒林之奇的大學改本〉，《幼獅學誌》第 18 卷第 4 期，（臺北：幼獅出版公司，1985 年 10 月）。

[23] 〔宋〕陳善：《捫蝨新話》（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影印《叢書集選》本），《下集》，卷 3，「漢儒誤讀論語」條。撰按：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第五章，〈一、中庸文獻的構成及其時代〉，謂陳善《捫蝨新話》疑朱熹所定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爲漢儒之雜記。今細加檢核，未見其文，不知徐氏何本。

[24] 此書原係程元敏先生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之博士論文，後增訂另於 1975 年自費出版，臺北，學海出版社經銷。

〈中庸〉簡編次第之見解雖有不同，但亦有相合之處，凡晁說之以爲「疑簡編謬于此」、「簡編之繆」、「疑簡編脫繆于此」者，乃涉及鬼神祭祀之事，而王柏亦皆移置下篇，足見王柏果受晁說之影響（撰按：猶有他證，詳第五節）。

細考晁、王兩種改本，其最大不同處，在晁說之強調「中庸」即是「誠明」、「誠明」即是「中庸」，故不依《中庸說》有二篇而分〈中庸〉爲二篇；王柏信今本〈中庸〉即《中庸說》二篇，故在移易章節後，認爲上編以「中庸」爲綱領，下編以「誠明」爲綱領。

王柏《古中庸》流傳不廣，明代王褘似知之而未見，曾論之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也。」[25]撰按：王柏改本並非單純分二十章以上爲上篇、以下爲下篇，王褘之說實誤。然自王柏之有此說，其後則宋末汪晫分〈中庸〉爲三篇，曰「天命」、曰「鳶魚」、曰「誠明」，日本伊藤仁齋則謂前十五章爲〈中庸〉本書，十六章以後與子思無關。[26]而近人之分〈中庸〉爲二篇者，乃多宣稱王柏分二十章以上爲上篇、以下爲下篇，其主張乃受王柏影響，如馮友蘭[27]、武內義雄[28]、徐復觀[29]、梁濤[30]皆是；蓋未讀程先生書、不詳王柏說、亦不知晁說之先有改本之故也。

五、論晁說之揭示曾子與子思傳承之關係應予重視

---

[25] 〔宋〕朱彝尊：《經義考》，卷 151 引。

[26] 汪晫、伊藤仁齋說，參見〔日〕武內義雄：〈中庸考〉（一名〈子思子考〉）引述，收入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2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一版，臺北坊間影印本），第一篇第十四章第八節，主張：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前半段「道前定則不窮」止爲上篇，似爲子思〈中庸〉原作；第一章及第二十章後半段「在下位不獲乎上」以下爲下篇，似爲《中庸說》二篇之類。

[28] 〔日〕武內義雄：〈中庸考〉（一名〈子思子考〉），主張：第二章至第十九章爲上篇，爲《子思子》原始部分；首章及第二十章以下爲下篇，成於子思後學之筆；但第十六章當移置第二十四章之下。武內氏文，收入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2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五章，主張：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之「道前定則不窮」止，爲〈中庸〉本文之上篇；自第二十章「在下位不獲乎上」以下爲〈中庸〉本文之下篇；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八章爲後世禮家雜入者，應刪。

[30] 梁濤：〈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臺大歷史學報》，第 25 期（2000 年 6 月），主張：第二章至第二十章「所以行之者一也」爲上半；第一章及第二十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下半；但其中第二十八章或爲錯簡。

晁說之欲以「曾子、子思」取代「子思、孟子」之地位，就動機論，蓋亦與反對王安石有關。考王安石初出，「見者以爲孟子」[31]，新黨主政，太子先《論語》而讀《孟子》，當時司馬光即有疑孟之論。晁說之紹繼司馬光之學，詆孟尤甚，後曾於哲宗朝奏請太子先讀《論語》不先讀《孟子》[32]，後且曾因詆孟而遭高宗申斥[33]，凡此皆可見晁氏欲以「曾子、子思」取代「子思、孟子」地位之動機。若捨動機而就文獻反映「曾子、子思」與「子思、孟子」何者關係較爲密切論，晁說之以爲〈曾子〉諸篇之與〈中庸〉，無論使用之文詞或反映之思想，其傳承關係，皆較〈中庸〉之與《孟子》密切，故應予重視。

晁說之申子思、詆孟子之論，王柏蓋曾受影響，其論子思曰：

> 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精慤邃密，皆孟子之所未發。[34]

推崇之備至，甚且以爲《論語》出子思纂集，〈大學〉、〈中庸〉并爲子思作。[35]而論孟子曰：

> 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真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終未能盡滌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絕之意多，而和平醲郁之味　。……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子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動」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子思子者尚淺淺。[36]

則不無微言矣。推王柏之意，蓋以爲朱熹以〈大學〉出曾子爲無據（撰按：詳下文），欲令子思直承孔子之道統且駕孟子而上之也。

唯是自朱熹纂《四書章句集注》，以〈大學〉屬之曾子，以〈中庸〉屬之子

---

[31]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續修、王梓材校補《宋元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卷 24，全祖望按語。

[32] 〔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 15，〈答勾龍壽南前輩書〉云：「說之前日叨爲太子詹事，請太子讀《論語》而未（撰按：「未」字疑爲「不」字之誤）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

[33]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云：「李泰伯（撰按：名覯）著《常語》非孟子，……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

[34] 〔宋〕王柏：《魯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影印《百部叢書集成》本），卷 2，〈誠明論〉。

[35] 程元敏：《王柏之生平與學術》，第參編第三章第二節，頁 512。

[36] 〔宋〕王柏：《魯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1968 年），卷 2，〈誠明論〉。

思，而構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道統，其說一枝獨秀，影響逾八百年，世人鮮有敢加議論者，晁、王二人申子思、詆孟子之說幾遭遺忘，晁說之力揚曾子之言論尤受忽視，而研究〈曾子〉諸篇者遂亦不絕如縷。

實則朱熹之說，自文獻學之角度加以考察，有一大缺陷，即《大學章句》中「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之言，羌無所本，而曾子、子思是否有師承關係，亦缺乏有力證明[37]。故證實曾子、子思在思想上之關係，實爲維護其道統說之所必須。證實之道，厥爲在〈大學〉、〈中庸〉之外，闡明屬於曾子、子思（或其學派）所作之篇章在思想上確有傳承關係。晁說之就〈曾子〉諸篇與〈中庸〉所用之文詞及反映之思想方面，論證曾子、子思之關係，其目的雖在揚曾貶孟，而就實質論，則可爲朱熹道統說之一助。清代邵晉涵蓋亦有見於此，嘗於〈與朱笥河學士書〉中表示，欲從《禮記》中摘出〈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合《大戴禮記》中之〈曾子〉十篇，及《論語》、《孟子》，名曰《四書》，而爲之注，以配《論語》、《孟子》，「實謂四子」。[38]蓋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關於曾子、子思之學份量過於單薄故也。

自郭店楚簡儒家著作出，學者多以爲該等篇章屬於子思學派，遂取與《禮記》〈中庸〉、〈緇衣〉、〈表記〉、〈坊記〉諸篇相印證。余前撰〈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39]，則主張該批資料可視爲曾子、子思一系之學，以其可與《禮記》〈中庸〉諸篇及《大戴禮》〈曾子〉諸篇互證也。若然，則學界對於《曾子》，似宜稍加措意，而推其本源，晁說之〈中庸傳〉蓋其濫觴矣。

六、結論

如上文所論，就寫作動機言，晁說之〈中庸傳〉乃爲反對新學新政而發，對中庸要義謹守漢唐宋初諸儒舊說，並無新見。然就掌握〈中庸〉學史俾得深入研究之觀點論，則有應予重視者在：可藉以考知宋代新學之說及其影響，一也；可藉以觀察後世〈中庸〉改本之流變，二也；提供先秦古禮書關係研究之明確方法，三也。以上對吾人思考如何詮釋古禮書，實不無助益。

其關於第一項者，晁說之〈中庸傳〉注文才三千字，又似無新意，若匆匆翻

---

[37] 〔宋〕衛湜：《禮記集說》，卷 123，引呂大臨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而朱熹《中庸章句》蓋以其言證據不足，僅以爲：「〈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又言：「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撰按：指孔子）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則論曾子、子思之關係極模糊。

[38] 〔清〕邵晉涵：《南江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8。

[39] 葉國良：〈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13 期，2000 年 12 月。

閱，極易忽略撰者之懷抱，而新學之中庸說遂亦難以考知矣。以此知古人著書要言不煩，而每有所指，若不先考其動機，則不能掌握其著述宗旨，讀之無益矣。

其關於第二項者，意義重大。〈中庸〉之有改本，自晁說之始，世人不知，誤以爲自王柏始。王柏分〈中庸〉爲二篇，後人既不詳其說，乃亦分爲二篇，自馮友蘭、武內義雄、徐復觀乃至今人梁濤，紛紛擾擾，愈行愈遠。梁濤既承馮氏、武內氏分今本〈中庸〉爲二篇之說，主張：上篇爲〈中庸〉、下篇爲〈誠明〉，此兩篇乃子思不同時期之作品，其思想亦異，〈中庸〉論外在之道，爲方法，〈誠明〉則論內在之心性，此兩者並非一個整體，將兩篇組合爲一極不合適。梁氏又受徐氏書論及《荀子・不苟篇》之影響，更進而宣稱：將〈中庸〉與〈誠明〉合編者，蓋爲荀子。考晁氏〈中庸傳〉之疑改，多有所依據，其無依據而有疑者，但云「無聞焉爾」而已，不敢逕行更動。馮氏等不信古人治學之嚴謹者之說，而信王柏之臆解，不知王柏治學見解極偏，對諸經多所疑改，而又不足信[40]。又凡改爲二篇者，其文獻之依據在《漢書・藝文志》載《中庸說》有二篇，今郭店、馬王堆出土之竹帛有〈五行〉及〈五行說〉，「經」與「說」之體例甚明，試問〈中庸〉何處爲「經」？何處爲「說」？分爲二篇後，又何處爲「經」？何處爲「說」？若指明某處某處爲「說」，則所謂「經」者尚餘幾何？尚足以成篇爲〈中庸〉（經）乎？凡此馮氏等人何以爲答！再者，研究古代學術，可貴者在有依據，若可憑空斷定篇名、編者，則是非無準，賢愚不分，尚有學術可言乎！試問《中庸說》二篇，一名〈中庸〉，一名〈誠明〉，此說有何依據？謂荀子合編〈中庸〉與〈誠明〉爲一，又有何本？又前人或謂極高明即道中庸，或謂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梁濤乃謂〈中庸〉、〈誠明〉無關不當合爲一篇，豈前人皆誤乎？蓋其種種揣摩，不外主觀臆測而已。皮錫瑞嘗謂：研究古禮不可以後人之所謂情理度之，否則多誤。[41]其說最爲通達，可爲好疑改古書者之炯戒。

其關於第三項者，尤爲緊要。蓋先秦古籍中不詳撰者之問題，莫如古禮書之甚，然研究古禮書，不講其學術譜系，則散漫無統貫，矛盾不合處難以詮釋。以二戴《禮記》言，今存者尚八九十篇，各篇所代表之學術譜系爲何？各篇之關係又如何？其相合者何在？不合者又何在？若未能盡力釐清，則該二書之研究，終屬混沌。晁說之所示方法，自非唯一；然前賢所憑以研究者，何者合理有效？優缺點何在？自爲吾人研究先秦古禮書必須正視之一大課題。

---

[40] 〔宋〕王柏：《詩疑》（臺北：大通書局，1969 年影印《通志堂經解》本），卷 1，謂今《詩經》有漢儒將孔子刪詩之餘纂入者三十一篇，當刪。而據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其中論及之〈將仲子〉、〈褰裳〉，在王柏三十一篇之名單中，以是知王柏之論，出於臆測。

[41]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本，1969 年），第 3 冊，〈三禮〉「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所見多謬」條。